

抗战期间昆明报刊的民族史研究

张雷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抗战期间,日本侵华导致的民族危机是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高涨的根本原因。当时昆明报刊就“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理论问题发起了一场影响范围广、参与人数多的大讨论,对当时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加强西南边疆各民族历史沿革的研究以及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实地考察、搜集资料是当时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不仅推动了西南地区民族史及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还对中华民族抗战大业的胜利完成提供了重要帮助。

关键词:抗日战争;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07)05—0119—05

抗战期间,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备受摧残,“文献的沦陷,发掘地址的沦陷,重建的研究设备的简陋和生活的动荡”^{①②}等因素使史学研究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为了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热情以备抗战之需,当时昆明主要报刊如《云南日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正义报》及《益世报》等,都开辟了史学专栏进行包括民族史在内的史学研究。在国难当头、史学研究比较困难的时期,昆明史学家能坚守史学阵地,利用报刊进行史学研究,这对推动中国史学发展弥足可贵。

一、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高涨的原因

民族史在抗战时期昆明报刊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促成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高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化大迁移给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带来了契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为保存文化设施,国民政府被迫采取了文化大迁移。大量的高校、科研机构及报馆等文化机构迁到了重庆、昆明等西南地区。据资料记载,此期间迁往云南的高校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组西南联合大学)、上海医学院、国

立艺术专科学校、同济大学、中法大学文、理学院、中山大学(澄江)、武昌华中大学(大理)、广州协和神学院等10所^③。除中山大学与武昌华中大学外,其余学校校址均在昆明。当时云集昆明的史学界人士有钱穆、顾颉刚、张荫麟、尹达、郑天挺、蒋梦麟、吴晗、陈寅恪、白寿彝、向达、杨向奎、雷海宗、林同济、楚图南、尚钺、方国瑜、江应祿等。此外,当时昆明的文化界人士还有费孝通、茅盾、曹禺、范长江、潘光旦、闻一多、李广田、冯至、沙汀、胡风等。他们有的直接参与到报刊史学专刊的编务之中,如著名史学家吴晗担任了《文化周报》总编辑;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开辟《边疆》周刊进行边疆史地研究;方国瑜、向达、凌纯声、楚图南等发起主办了《西南边疆》杂志,对西南地区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研究;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编辑《战国策》半月刊等。还有众多的史学家及文化界名流在昆明报刊上发表民族史作品以激发国民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热情。大学教授及科研人员云集昆明,为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的勃兴提供了智力支持。

其次,云南地区抗战地位的提升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的繁荣。抗日战争期间,沿海口岸被日军封锁,海上国际交通线基本上被切断。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空线、中印公路四条陆、空运输线,分别成为中

收稿日期:2007-05-29

作者简介:张雷(1973~),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商丘师范学院行政学与法学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与史学理论、法律史学研究。

国在抗战不同阶段维持对外交通、获得外援和开展外贸的主要国际通道。可以这样说,在整个抗战期间,云南一直是维系中外交通的重要通道,是争取外援、沟通后方运输的中转站,是中国与反法西斯盟国联系的主要门户。昆明又是这四条国际通道的枢纽,昆明抗战地位之高可见一斑。一些报刊也因此迁往昆明出版。据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昆明报刊多达60余家,这在昆明报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昆明报刊事业的繁荣给报刊史学研究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发展空间,一定程度上也为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平台。

再次,民族危机加重是促使昆明报刊民族史学勃兴的另一因素。中国史学传统蕴含着民族忧患意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尽管出现了多重内涵与风格迥异的史学波峰,然史家的民族忧患意识始终随着史学的跌宕而起伏。即便处于盛世时代,有责任感的史家也往往发出忧患意识的警醒,在民族危机加重之际,民族危亡的忧患意识更是史家著书立说的巨大精神动力。日本武力侵华的同时,屡次以歪曲事实的手段在中国民族问题上制造事端,妄图利用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面对日本的文化侵略野心,国内很少有人识破这一阴谋,因此也就疏于防范。各民族之间由于旧时代的历史积怨导致的不和睦现象也很严重。这些都是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因此,对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研究,让边疆民众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培养他们的爱国热情,以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就成为当时的一项紧要任务。基于此,恢宏民族意识成为当时史学研究的突出主题,昆明报刊的民族史研究也就当然成了昆明报刊史学研究的主体部分。

二、“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理论的大讨论

昆明报刊开展的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理论大讨论,是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反抗外国文化侵略的爱国表现。它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一些学者就收集我国西南边疆史地资料,歪曲历史,伪造史实,为侵略政策张目。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界人物和一些“学者”屡次使用“中国本部”一词,蓄意将中国边疆地区与中原隔离开来,又捏造出这些边疆地区历来不是中国领土的谬论,从而为分裂中国提供理论依据。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则明确指出,“兹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中国之领土,亦非中国的特殊区域”。当时的日本学界也“无不以满蒙非中国之领土”,日本帝国大学则把这种言论公开向世

界发表,妄图用他们的荒谬观点混淆视听。这种否认“满蒙”属于中国的言论,则更赤裸地显露出他们为侵略罪行进行狡辩的丑恶嘴脸。

为揭穿敌人用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阴谋,一种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民族理论的出现显得尤为迫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拉开了这场民族理论问题大讨论的序幕。顾颉刚通过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梳理,有力地阐发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理论。顾氏认为,那些把中华民族分为“五大民族”的做法危害中国的统一,不利于抗日大业的完成。他揭穿了这种利用文化侵华的阴谋,“日本人假借了民族自决的名义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而硬造一个伪满洲国。继此以往,他们还要造伪大元国和伪回回国,自九·一八以来,他们不会放松一步,甚至想用禅族作口号以捣乱我们的西南。此外也有别的野心国家想在我们的边疆上造出什么国来”。于是对民众提出了如下要求:“在我们的历史里,只有民族的伟大的胸怀而没有种族的狭隘观念!”“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我们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民族的界限”^①。此后,顾颉刚又撰写《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先后在1939年5月8日、5月29日《益世报》上发表,与费孝通就民族问题展开讨论。该文又指出,“五大民族”一词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只会授帝国主义者以分裂我国的藉口,所以我们应当正名,中华民族只能有一个,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分出什么民族。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理论的提出,是与其强烈的爱国热情分不开的。九·一八事变以后,顾颉刚就在燕京大学参加“抗战十人团”、“燕大中国教职员抗日会”等抗日组织,并担任宣传干事,运用多种方式进行抗日宣传。顾颉刚还与同事一道成立“三户书社”,后改为通信读物编刊社,出版通俗读物,宣传抗日。全面抗战爆发后,顾颉刚被迫离开北平,随通信读物编刊社迁到绥远。同年8月,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聘用并被派遣至西北诸省进行考察。9月,抵达兰州,任甘肃青年所办“老百姓”社社长,出版《老百姓》旬刊,以西北民歌方式继续进行抗敌宣传。后又辗转到昆明,在《益世报》上发表抗战文章。不难想象,自从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以来,顾颉刚胸中激荡的是抵抗外敌的爱国热情,并且与日俱增!

除进行抗战宣传外,顾颉刚还积极寻求解救民族危机的良方。早在燕京大学参加“抗战十人团”时,顾颉刚就认识到了解决民族危机的有效方法就是加强民族史的研究。他说:“改造中国历史,即可以改造一般民众的历史观念,

第一部史应为民族史。”^{[14]P20}后来,顾颉刚认识到边疆地理的研究是民族史研究的基础。1936年顾颉刚创办了禹贡学会,其主要目的就是为民族史研究提供地理方面的研究。他在《禹贡》发刊词中明确指出:“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15]此处可见他对民族史研究认识的加深。1938年12月,经过颠簸之苦的顾颉刚来到昆明,在昆明《益世报》开辟《边疆周刊》,并希望通过民族史的研究,激发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16]。顾颉刚认为,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民族史是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良药。

正因为顾颉刚具有如此强烈的爱国热情,又有解救国家危机的责任感,因此,他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显得是那么顺理成章。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提出后,在知识分子中间引起很大反响。他们纷纷发表文章对“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理论表示支持与呼应。马毅在《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一文中认为,加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有利于中国的抗战事业,同时“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也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17]。施养成的《汉夷一家的历史观》明确指出,所谓的夷与汉,只不过是名称的差异而已,他们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因此少数民族与汉族从本质上来讲应该是一家^[18]。杨向奎在《论所谓汉族》一文中说:“汉族本包括各族,如夷、苗、夏、商、周,他们的地位平等没有主体与附庸之分”,“黄帝与蚩尤战,只能说夏与苗战,因夏与苗全是所谓秦汉统一民族后之一体”。他又说:“祖先的共同与否,不足为民族同与不同的证据,因为古代对于始祖只是一种神的崇拜,并不足以说明种族的起源。”^[19]更有学者高度评价了顾氏的这篇文章的政治意义:“在此危机存亡之严重时期,团结内部是极端要紧的一件事,可惜我们仍然为以往的几种错误的见解所拨弄,不能彻底泯除彼此的成见。顾先生的这篇文章,是从历史的事实上说明我们是一家,坚强的建立起‘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来使于无形中加强我们团结的思想,这正是解救时弊的一付良剂,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是应当十分留意的。”^[20]还有学者认为:“汉族的汉,只是一个朝代的称号,不是一个种族的名称,现在中华民族自称为汉族,其原因完全是政治的和习惯的……今此谓苗夷等人,自然是构成整个汉族的极重要的分子,他们与汉族的关系最为密切,溯其源流可以说是同一的民族。现在我们可以根据语言、传说、历史、体质各方面的事实来证明此说。”^{[21]P1}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也在重庆的《中苏文化》杂志上发表了《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一文,参与到了这

场民族理论大讨论中来。他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包括满、蒙、藏、回等众多的民族都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前提下,是完全能够共同发展繁荣,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增添光彩的。”^{[22]P189}昆明报刊上支持顾颉刚观点的文章还有很多,足见此观点在学界流传的广泛程度。

当时也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顾颉刚的观点。如费孝通在《益世报》发表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一文就对顾颉刚的一元民族观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境内除存在有五大民族外,还有许多人数量较少的民族,尽管人数不多,但他们都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中国民族应是多元的。费孝通还认为,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费孝通认为:“唯有事实上认识边疆,我们才能保护我们的边疆。”^[23]

其后,这场学术讨论因费孝通的退出而趋于平息。但这场关于民族问题的学术大讨论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广泛而深远的。由于认识民族问题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他们的民族理论所产生的影响也表现在不同方面。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支点是抗战。当时的中国处于危难之际,整合全中华民族力量进行抗战是当务之急。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突出阐发了中华民族的紧密联系和共同利益,这有利于激发民众的民族凝聚力,增强爱国热情,从而坚定抗战的信念。在抗战过程中,之所以能形成全国人民空前团结、众志成城进行抗战的壮举,都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有密切关系。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观是与抗战的主题合拍的,它对抗战事业的最终胜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费孝通强调中华民族的“多元”则具有学理上的重要价值。他认为,在中国境内,存在着许多在语言、文化特征等方面有着差异的民族。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绝不能因过分强调其统一性而忽略他们的差别。这种观点为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代民族理论提供了基础。所谓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即“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往、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24]P131}这一核心观点是与

他早期民族多元的观点一脉相承的,是其早期民族多元观的发展。

三、昆明报刊对西南少数民族史的研究

民族理论的大讨论引发了民众关注民族问题的热潮,也为民族史研究烘托了气氛。为提升民族凝聚力,民族史研究必须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对中华民族史进行整体了解。只有对各个单一的少数民族有了深入了解,对中华民族整体了解才有可能。一句话,少数民族史研究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另外,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地报刊的史学研究就不可避免地把该地少数民族史作为研究重点。抗战期间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沿革的研究。由于受中原正统观念的影响,加上西南少数民族居住区地势险峻、交通闭塞、语言不通等因素,在传统民族史研究中,有些少数民族的历史从没有被涉猎过。即便对某些少数民族有所研究,也存在误解甚至曲解的弊端。这无疑给外界正确了解少数民族带来了困难,也不利于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了解。随着对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深入,一批关注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沿革的文章在当时的昆明报刊上发表,如《西南边疆》第八期的岑家梧《云南嵩明县之花苗》与和永惠《云南西北之康族》、江应樑《云南西部边境之僂夷——〈云南西部边疆中之民族〉之一》(益世报,1939-10-30)、《云南西部边疆之汉人与山头民族》(益世报,1939-11-13)、《云南西部边境中之僂僂等民族》(益世报,1939-11-20)以及杨湛英《沧怒流域的僂僂》(益世报,1943-11-13)等。此类文章对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沿革、迁徙路线、生活变迁等问题进行了详尽考证,不仅为外界了解西南少数民族提供了便利,更丰富了民族史研究内容。

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实地考察、搜集相关资料。传统史学中少数民族史研究历来就不发达,而处于边远地区的云南少数民族史研究则更显薄弱,讹误现象大量存在。当时就有学者论及这个问题:“云南史地上的讹误实是数不胜数,这原因第一,中国史学家只是兢兢于文字,名词之辨,不能作实地考证和调查;第二,云南土地辽远,又是蛮烟瘴雨;中土人士,到此不易,所以于这里的史地的研究,只能凭诸传说、或悬想、或揣测。”^{[15]377}按照该学者的观点,解决上述问题的最佳途径莫过于进行实地考察。当时,就有许多民族史学家受雇于政府机关或学术团体,对西南地

区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实地考察。顾颉刚、楚图南、方国瑜、江应樑、白寿彝等都参与了当时的考察工作,并在昆明报刊上发表相关调查报告和文章。如方国瑜的《班洪风土记》(西南边疆,第一期、第二期)与《卡瓦山闻见记》(西南边疆,第十期)、方豪的《路南撒尼阿细二族琐记》(益世报,1939-07-25)、江应樑的《云南西部僂夷民族之经济社会》(西南边疆,创刊号)等,都是根据考察资料编写而成。这些考察报告涉及范围较为广泛,如少数民族的语言、体格状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抗战期间的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具有政治与学术上的双重意义。

昆明报刊的西南民族史研究给抗战大业的胜利完成提供了学理支持。首先,昆明报刊的民族史研究戳穿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阴谋。帝国主义采取文化侵华政策由来已久。为了侵略中国的云南地区,西方学者把南诏说成是泰族建立的国家,他们又精心虚构一个泰族早期历史的线索,进而捏造出南诏地区历来不属于中国的谬论,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云南“制造历史依据”。日本也在武力侵华的同时,屡用文化侵华策略进行配合,为侵略行径及分裂中国边疆寻求理论依据。因此,该时期的民族史研究,尤其是边疆民族史研究就具有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如方国瑜发表的《僂人与白子》(益世报,1939-10-02)、《南诏是否泰族国家》^[16]等文章,利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南诏并非由泰族建立的国家,通过资料证明,汉朝时期南诏所辖地区就是汉王朝的一部分。方国瑜的结论戳穿了外国侵略中国西南边疆的阴谋,给他们的文化侵华政策给予了有力回击。其次,纠正了当时一些错误民族观,为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作出了贡献。“咸同滇乱”是近代云南发生的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由于传统的中原正统观念,这次回民起义被定性为动乱。白寿彝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收集,对“咸同滇乱”问题给予客观评价。他说,探究“咸同滇乱”的责任,“曲不在汉,也不在回,而要在官”,统治阶级的腐败才是这次运动的根源。同时提出,“咸同滇乱”“是民众武力反抗清政府的第一声”^[17]。回民起义被视为当时全国人民抗清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反抗压迫的进步意义。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团结西南地区的回族人民,对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着重要意义。当时就有学者认为西南地区的民族团结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有着重要作用,“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知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18]。“西南民族聚居之区域,皆今日全国国防之重要地带,国防

前线之人民,若不给与民族国家之意识,不能使之开化而内附团结,一朝有事,不仅不能作我们卫国之前驱,恐更将成为敌人极好之武力,是开化夷民,在非常时期之国策上,当为要务”^{[19](P6)}。因此,白寿彝的观点与抗战的时代主题是吻合的,有利于西南地区民族团结,给抗战事业的胜利完成了提供了学理的支持。

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在学术上的重大意义,是推动了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首先,民族调查工作给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资料。江应樑、白寿彝、方国瑜等通过实地考察,搜集了大量关于民族史的资料,为以后他们研究民族史提供了帮助。后来,他们大都利用抗战时期搜集的丰富资料,写出了影响较大的民族史著作,成为我国民族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如方国瑜《彝族史稿》、江应樑《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及《摆彝的生活文化》、白寿彝《回民起义》等。同时,这些材料丰富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史的内容,一定程度上也拓宽了民族史研究的范围。正如江应樑所说:“从边民底历史演进、民间传说、种种来源上可以给我们民族历史上极大之论证与直接之史料。从边民之骨骼构造、身体形状、毛发种类等可以给人类学研究上无上之资料。从边民之社会组织、家庭情形、社交往来上可以窥见初民及原始社会底遗型,而给我们以人类原始生存状态及古代社会研究上之事实的佐证。其他语言、文字、风俗、信仰、居住地区的分布、种种,每项都是一种专门学术之宝库。”^{[19](P8)}其次,广泛搜集、甄别采用史料的治学风范给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借鉴。例如白寿彝为了搜集散落在民间的关于回族起义的资料,“以执著的精神千方百计到处访求,包括在昆明和外县,克服种种困难,他辗转寻觅,找到了一些原始资料和抄本”^{[20](P9)}。他搜集史料的范围涉及到公函、文告、遗藏、口述、笔录、抄本、布告、碑刻、私藏、官方馆藏等。他甚至连在字纸篓里捡来的资料也不放过,如在《回民起义》一书中,《永昌府保山县汉回互斗及杜文秀实行革命之缘起》、《兴师檄文》等篇都是从昆明一家寺庙的纸篓里捡来的资料。他还把搜集到的材料进行仔细考证,与其它材料多方面比较、验证,然后才审慎使用。他们在史料搜集与运用方面的卓识,在西南民族史研究领域起到了典范作用。自此,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治学方法在西南

民族史研究领域被广泛应用,以方国瑜、白寿彝、江应樑为代表的民族史学家的推动之功是不容低估的。

总之,在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一批学者克服了生活环境、物质条件和出版上的多种困难,发奋从事民族史研究,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他们的努力,书写了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很有意义的一页。抗战时期昆明报刊的民族史研究有力推动了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同时,对抗战的学理支持则更富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 [1]张荫麟.中国史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2]唐正芒.抗战期间的高校西迁述论[J].云梦学刊,2002,(5).
- [3]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N].益世报,1939-02-13.
- [4]顾潮.顾颉刚年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 [5]禹贡·发刊词[J].禹贡,第一卷第1期,1934-03-01.
- [6]益世报·边疆周刊发刊词[N].益世报,1938-12-19.
- [7]马毅.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N].益世报,1939-05-12.
- [8]施养成.汉夷一家的历史观[N].正义报,1943-11-23.
- [9]杨向奎.论所谓汉族[N].益世报,1939-07-17.
- [10]华.读了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后[N].益世报,1939-02-27.
- [11]张延林.再论夷汉同源[J].西南边疆,第六期.
- [12]田亮.抗战时期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13]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N].益世报,1939-05-01.
- [14]费孝通.从实求知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15]楚图南.中国西南民族神话的研究[J].西南边疆,创刊号.
- [16]江应樑.南诏是否泰族国家[J].新动向,第三卷,第6期,1939-12-01.
- [17]白寿彝.关于咸同滇乱之弹词及小说[J].西南边疆,第十四期.
- [18]楚图南.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为鲁迅逝世第二周年纪念作[N].云南日报,1938-10-23.
- [19]江应樑.考察云南边地民族的重要性[J].晨曦,1938-05-01.
- [20]陈其泰.白寿彝先生编纂《回民起义》的学术价值[J].回族研究,2002,(2).

[责任编辑:杨 究]